

# 從學術界的邊緣，如何國際化？關於執行 「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 教育部標竿計畫的經驗

## How to Internationalize From the Margins? Reflections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nchmark Project “The Transcultural Sino-Island: The Global Sinology Forum at NSYSU”

莫加南 Mark Frederick McConaghy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mark.mcconaghy@mail.nsysu.edu.tw

### 【摘要 Abstract】

本文就作者在 2021 年至 2024 年實施教育部標竿計畫「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的經驗，進行了一系列反思。本文探討了位於臺灣知識、經濟和文化中心——大臺北地區——以外的大學如何有效實施國際化策略。鑑於臺北高校擁有的巨大優勢——北方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第一流品質，北方代表性的文化單位（包括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等），交通系統更便捷，雙語環境更友善等——這些優勢使其更容易吸引國際學生和學者，並更全面、更迅速地與國際學術網絡建立聯繫。本文認為，只有南方地區的主管兼具創造力和勤奮精神，才能有效地使其大學實施大膽的國際化項目，並最終平衡臺灣高等教育長期以來存在的南北差距。本文接著介紹「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的問題意識與創造性的國際交流活動。文章也提出了教育部應採取的一系列具體政策舉措，以便更輕鬆、更有效地實施未來的「標竿計畫」，包括計畫主持人的課程減免、更可靠、更合理的資助時程以及更有彈性的經費核銷規則。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eries of reflections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mplement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Benchmark Project “The Transcultural Sino-Island:

The Global Sinology Platform at NSYSU”from 2021 to 2024. It engages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universities located outside of Taiwan's intellectu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he great Taipei area- can effectively imple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Given the overwhelming advantages that Taipei-based institution possesses- the higher quality of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the north,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enters that define the north (including the Palace Museum, the National Library, etc.), the mor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great degree of bilingualism, etc. - it is far easier for them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 and to connect more thoroughly and quickly wi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network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only a combination of creativity and diligence on behalf of administrators in the south will effectively allow their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bold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grams, and to eventually balance the long-standing north-south divide in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essay goes on to introduce the central problématique and various programming initiatives of the Global Sinology Platform at NSYSU. The essay also offers a series of specific policy initiatives that the MOE should pursue to enable easier and mor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uture Benchmark projects, including course relief for project managers, more reliable and reasonable funding timelines, and greater flexibility in invoicing.

### 【關鍵詞 Keywords】

臺灣高等教育、南北差距、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南部永續性的國際化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North-South Imbalance, The Global Sinology Platform at NSYSU,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South

## 一、前言：臺灣學術界南北不平均之現實

曾在臺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島上有非常明顯的「重北輕南」問題。北部為臺灣金融、行政、政治、媒體、文化、高科技產業以及國際交通的中心。北北基桃加上新竹的科學園區代表臺灣最現代的區域。從宏觀的生產毛額，環保品質、生活捷運的便利、人行道的完整規劃、著名國高中、國際機場等，北部作為臺灣本島的蛋

黃區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北部幾乎天天都是藍空，與中南部的灰色空氣天壤之別。當你搭乘高鐵，一離開了臺北一帶，尤其到了中南部，好像進入另外一種國家，不是天龍國的可愛小巷子、優雅細緻的公園、文化氣氛濃厚的咖啡店與藝術中心，而是一系列鐵皮屋的工業區，加上無垠的田地。雖然南部有它獨特的美麗，但是它本身的交通不便、行人道充滿障礙、空氣品質等問題，很難不讓南部人擁有莫名的憤怒感，經常會嘆問：「為什麼小小的臺灣在南北地區上竟有如此大的差別？」

從學術體系的角度而言，也存在長期「重北輕南」的現象。臺灣最頂級的學術單位都在北部，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國家最重要的研究性單位也在北部，包含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館、國史館等。國家最重要的文化單位也都在臺北，包含文化部、故宮博物院、國家兩廳院、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等。是非常難對外國人說明為何 1949 年之後的國民政府將幾乎所有的第一流教育與文化單位都至於臺北，而島上的其他的地區好像永遠鎖定為工業區與農業區。重北輕南的歷史原因值得被學術討論，但是歷史如何解釋，不會改變現況——臺灣的知識生活完全圍繞島嶼的北部，中南部的學校明顯在資源分配、圖資系統、地利位置、國際人脈等各方面面對嚴重的挑戰。

國立中興大學邱貴芬名譽教授長期對中部學術界做貢獻，將她一切的學術精神投入到充滿活力的「台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所」，讓它成為臺灣人文學界的亮點。在最近的著作《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中，邱老師分析臺灣文學界南北不平均的情況如下：

建立一個作家文學地位的過程中，文學獎是鯉魚躍龍門的重要門檻。獲得全國性文學獎，往往讓獲獎者迅速提升知名度，獲得臺灣文學圈的注意力。但是，具名的文學獎選薦，如國家文藝基金會的文藝獎、聯合文學大獎、臺灣文學金典文學獎等具指標性的臺灣文學大獎，中南部作家競賽的資本無形中屈居弱勢：不居住在主流文學中心都會，遠離主掌認可機制的網絡，難以參加主流文學圈所舉辦的各種活動來增加曝光機會，無法以主流習俗的語言風格來和掌權的評審、出版社、雜誌社主編交流，無法搭建豐沛的人脈，這些都是中南部作家所面臨的挑戰。這種南北地理差距涉及的種種美學、觀點、語言和人脈的差異所造成的南部作家的苦境，放大在世界文學領域，就是小文學的縮影。（邱貴芬，2023，頁 143）

文學界如此，學術界也是如此。不居住在主流學術中心都會，遠離掌握認可機制的中央單位、難以參加主流學術圈所舉辦的各種活動來增加曝光機會，無法和掌權的學術期刊主編、出版社、有影響力的學術領域大師時刻交流，無法搭建豐沛的人脈，都是南部的學者長期面對的挑戰。我還記得我第一年在中山任教的時候，有一位資深的老師對我說：「中山文學院最大的好處是很安靜，沒有人在這裡會打擾你，很適合看書，好像是世外桃源」。世外桃源有它的魅力，但是作為國際性的大學，我們希望全世界的學生與老師會進來，讓寧靜的柴山漁港成為熱鬧的學術陣地。

坦白說，執行「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最初步的動力真的只是抵抗南部學校會給人家的「世外桃源」的偏僻感。如果大部分的國際漢學家平常不會到高雄來，連一次來過高雄都沒有（因為高雄沒有跟漢學有關的圖書館，何必來？），我們就是要想辦法讓他們進來，讓他們多留幾步在西子灣，讓我們的人文學院慢慢成為臺灣南部與世界的重要橋樑。

## 二、從偶然的巧合開始：「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的構想

在 2020 年冬天的某一天我在中山大學文學院走廊裡碰到賴錫三教授。即將要前往教室上課的我剛好手中拿著楊儒賓教授所寫的《1949 年禮讚》，作為當天的教材。在此之前我與賴老師的交流很少，剛好賴老師 2018-2019 在芝加哥大學當作訪問學者，沒有機會與系上新進來的人員進行交流。賴老師看到我手中拿著楊老師的著作，他立刻問我：「你覺得那本書寫得怎麼樣？」我積極回答：「寫得非常好，因為有這本書，我終於有一種完整的框架，能夠清晰思考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也能夠清晰思考中華文化與臺灣的關係」。我們立刻開始討論本書的不同章節以及楊老師的關鍵理念。不知不覺中，二十分鐘已經溜去，我差點錯過上課時間！從那天開始，我與賴老師的互動越來越多，主要的對話圍繞楊儒賓的理念：臺灣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的獨特島嶼。我與賴老師也經常會討論我們共有的焦慮，即兩岸的處境。我們不想要看到兩岸的關係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經常一起討論知識分子面對此處境的時候到底可以做什麼，如何提供鞏固兩岸關係的新論述？那個時候我已經用系上的一點經費邀請在海外認識的幾位老師到中山來演講，主要動機為不要在遙遠的臺灣南部太寂寞，在西子灣想要看到我以前在北美所認識的幾位學者。一位學者如

果身於北部永遠不需要擔心寂寞，因為每年全球的漢學家們幾本上都會到臺北來一趟，前往中研院、臺大、國圖等做研究，參與國際會議，來看老朋友等。臺北就是這麼一個國際性的城市。邀請一些學者南下只是趁他們在臺北的時光，說服他們坐 90 分鐘的高鐵，來看天龍國之外的臺灣。那個時候中山校方也許有聽到我最近幾個月有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學者南下，因為不久後，我與賴老師被校方邀請參與學校的行政會議，做 5 分鐘的簡報，展現我們對「國際漢學在中山」未來發展的想法。我與賴老師去行政大樓報告，分享我們對「國際漢學」的初步構想。不久後我與賴老師受學校鼓勵向教育部申請「標竿計畫」，助學校將更多的資源到南部來，讓文院對學校的國際化目標做貢獻。

我與賴老師很快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要辜負學校對我們的期待，那有可能真的要提一個計畫書。我們在研究室裡開始集思廣益。我們到底可以執行什麼樣的計畫？我們開始從「漢學」的角度討論臺灣的學術歷史，尤其是 1949 年的發展，慢慢構想「漢學之島」的概念。其實「漢學之島」無甚高論，主要的意思是臺灣是一種華語語系的社會、主流的語言如華語、閩南話、客家話，都是漢藏語系的一部分，都在島嶼上的生命十分堅強。無論在明證、清代、日治時期或 1949 年之後，漢字作為書寫與繪畫的媒介也在島嶼上有頑強的生命力。因為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的關係，臺灣在那個時代吸收了大陸重要的文化單位如中研院、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國立清華大學等。因為當時的政權非常重視中華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所發揮的倫理作用，希望現代國家建立於中華「三道合一」的文化土壤上，提供給戰後臺灣漢學蓬勃發展的條件，不只是讓新儒家大師如牟宗三與唐君毅在島嶼上落地生根，也讓島嶼的每所國立大學都建立完整的中文系統，讓中華文明的「文史哲」傳統當作島嶼學術體系的核心。

臺灣漢學在冷戰時代的世界學術版圖裡的位置非常獨特。1949 年之後的大陸基本上對北美、歐美與東亞的學者關閉，但是臺灣恰恰相反，對北美、歐美與東亞的學者完全開放，因此兩代的國際漢學家（1949-1980）都優先到臺灣來學中文，有機會師從臺灣中文系的大師、也接觸到寶島活生生的漢人文化。雖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海外漢學家有機會前往神州大地去深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學家進行交流，但是在國際漢學的世界版圖裡，臺灣很獨特的地位從來沒有消失過。因為臺灣的政府、學術界、教育界以及民間社會對中華文化的保留有非常正面的態度，也因為中華民國在臺灣維持民主法治的穩定制度，包含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集合自由

等面向，島嶼到今天還是國際漢學家心目特愛的交流與研究之地，在民主的氛圍下讓他們享受活生生的中華文化。<sup>1</sup>

「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一方面是要提醒臺灣的學術界漢學是臺灣國際軟勢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方面是要回應以上所述的「重北輕南」的社會現象。在臺灣漢學圈裡，天龍國一樣是佔優勢。外籍漢學家訪問臺灣的時候，因為他們要麼是獲得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要麼是獲得外交部的臺灣獎助金，他們的活動範圍會圍繞北部的核心單位如國圖、中研院、臺大、故宮博物院等。獲得臺灣政府學術補助的海外漢學家能夠在大安區租可愛的小套房，天天坐捷運到以上的單位，好好享受豐富的圖書資源，晚上去逛夜市或在小巷子裡的咖啡店吃飯。如果漢學家離開了天龍國，基本上是前往「邊緣」的學校去演講，頂多在臺中、臺南或高雄住了兩三天，當作渡個假而已，看看「民間臺灣」的面貌。難怪在國際漢學出版界裡我們能夠讀到與臺北的文化史有關的專書，但是類似關於臺南、高雄或其他地區的外語書籍幾本上是沒有的。(Allen, 2011)

基於上述的考量，我與賴院長規劃「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的時候知道無法模仿「臺灣獎助金」或「國圖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的執行模式。很少的學者會想要花半年的時間在中山進行與漢學有關的研究。這個是無可厚非的：中山的圖資處的資源非常有限，幾本上沒有第一手資料，完全無法與北部的單位競爭。我們得另外想辦法吸引國際學者南下。我們想要提供的是一種充滿議題性、學術性、國際性與本土性的 Forum (平台)，即邀請國際學者南下進行系列演講、工作坊、座談與訪談，和在地的師生進行實質、面對面的、開放的交流。學者訪問中山之前，中山的師生們已經對他們的作品進行深刻地閱讀，準備與他們進行詳細的，深度的討論。我們能夠提供給學者最重要的禮物不是研究經費，也不是史料，而是我們的時間與關懷，圍繞訪問學者的學術作品進行一系列有聚焦性的對話，延伸他們自己的學術計畫，深化他們想要推動的學術論述，點燃學術火花。

按照這個模式我們以「思想風雲在中山：國際漢學家系列訪談」作為總標題，為了如下的著名學者舉辦聚焦性極高的學術論壇與訪談活動：美國哈佛大學王德威老師、美國芝加哥大學任博克老師、東京大學石井剛老師、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羅亞娜老師、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陸敬思老師、韓國延世大學白永瑞老師、

<sup>1</sup> 如果讀者想要進一步了解臺灣如何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自由民主的制度融合起來，可以參考楊儒賓 (2015)，《1949 年禮讚》，臺北：聯經；楊儒賓 (2023)，《思考中華民國》，臺北，聯經。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柯瑞佳老師等。除了身於海外漢學家之外，我們也邀請了在臺灣任教、落地生根的外籍漢學家受訪，包含輔仁大學何重誼老師、國立東華大學傅可恩老師、中研院康豹老師、華梵大學康特老師、政治大學馬愷之老師、中研院何乏筆老師、中山大學張錦忠老師、中山大學宋灝老師以及師範大學賀安娟老師。我們也邀請臺灣籍，國際學術影響力極高的漢學家，包含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及中研院院士楊儒賓、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及中研院院士鄭毓瑜、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主席與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中研院兼任研究員彭小妍、國立政治大學林鎮國、中央研究院院士、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李豐楙以及曾任監察院副院長、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榮譽教授孫大川。我們將紀錄片上傳到我們的網頁上，讓全世界的觀眾們共享（<https://youtu.be/16N9Nzogws0?si=mF5ETyQKct7uVBLc>）。訪談不只是給學者機會討論他們學術生涯最重要的著作；更重要的是討論他們與臺灣的關係，包含他們第一次到島嶼上來、他們如何體驗臺灣民間社會的人情味、臺灣的學術體系如何幫他們學中文、如何在島嶼上接觸到中華古典與近代的文化。我們希望聽到的是學者的學術 DNA 如何被臺灣影響，這個獨特的島嶼的文化風土如何間接或直接影響他們的人生觀。能夠與那麼多的第一流的學者進行親密的對話意義非凡，因為如此，我們將這些對話看成是重要的臺灣學術史的資料。

賴院長常常開一個玩笑：「學者們到中山來，一定會有什麼事情需要發生」。他的意思是我們的平台的基本精神不是舉辦一系列的形式化的演講，氣氛呆板無味的。我們所舉辦的每一場學術活動為一種真正的 *intellectual event*（知識事件），深化學者們自己的研究，促進重要的學術交流，點到核心的哲學或歷史上的議題。這樣一來，我們將這個平台看成是一個活生生的學術共同體。中山校園本來很偏僻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一個優勢。因為學者們可以在沙灘散步，在柴山的樹下漫談，在文學院高樓層觀望整個西子灣。能夠呈現出與北部完全不同的學術氛圍，充滿議題性與學術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充滿人性。我們所邀的學者是學術的夥伴、哲學的對話者，但是他們也都是長輩與朋友。在面帶大海、靠背山脈的中山文學院學者們可以放緩腳步，慢慢呼吸，投入有意義的對話，甚至書寫關鍵的作品。

我們不以豐富的圖書資源或很高的出席費來吸引學者，而提供給他們我們最珍貴的資源：熱情與關懷，加上獨一無二的思考環境。

### 三、從漢學之島的角度，中心思考 1949 年的意義

我們從一開始執行計畫就知道，不能用一種「為了辦活動而辦活動」、「為了花掉經費而花掉經費」、「為了製造 KPI 而發表論文」的態度來執行。如果這樣做，計畫本身會淪為形式化的負擔，只是乏味的行政工作而已，寧可不要做，將書房的門關起來，好好看書，發表自己的單篇文章即可。我們知道如果計畫不會成為呆板的任務，它在背後需要一種深刻的價值理念，當作我們往前邁進的動力。在 2020 年冬天，從一開始擬第一年的計畫書，賴院長一直跟我提他心目中最珍惜的概念：「共生」。我與賴院長合作那麼久，很難沒有共同的理念，當作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凝聚力。我們都深刻收到了楊儒賓的學術影響，包含楊老師的哲學觀點與歷史關懷。關於後者，我們當然很擔心兩岸和平此重中之重的問題。作為中華寶島的臺灣，它與對岸的中國大陸共同享受重要的文化資產，如楊儒賓老師（2021，頁 8）所寫的：

臺灣生活世界的重要成分是漢文化，構成兩岸具體的文化因素：語言、文字、藝術、宗教信仰，縱非大同，至少都可大通。而且臺灣自有歷史規模的記載以來，兩岸的歷史始終糾雜參差，剪不斷，理還亂。從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以迄今日，兩岸共同面對或反應變局的歷史更不可謂不深廣。上述所說都是臺灣的 Dasein（此在），在意識型態的火藥庫還沒爆裂之前，這些地理的與歷史的因素已經存在了，Dasein 的先行結構構成了文化島嶼存在的基礎。

從漢文化作為島嶼先行結構的角度而言，兩岸的關係能夠走向今天查槍走火的情勢，真是不可思議的。如何從中華文明的內部發展思考兩岸共生，如何想像一種能夠安頓兩岸關係的哲學框架與公共論述，是迫不及待的任務，也是我們最近四年一直在努力思考的議題。

從計畫第一年開始，我們努力舉辦圍繞「兩岸共生」的學術活動，包含 2021 年 8 月至 9 月舉辦的「Think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思考中華民國》國際論壇」，邀請從七個不同的國家的國際漢學家一起細讀楊儒賓的新大作《思考中華民國》，進行一系列的回饋與交流，重新點燃「中華民國」作為思考中國現代性的認識論框架。參與的學者包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 Timothy Cheek 教授、蒙特婁大學歷史系 David Ownby 教授、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楊孟軒副教授、香港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化學院 Edwin Michielsen 助理教授、亞伯達大學東亞系 Christophe Lupke 教授、紐約大學歷史系 Rebecca Karl 教授、CY 塞爾吉 -

巴黎大學張倫教授、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翻譯研究學系教授史峻教授以及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與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我們不只是將論壇的線上討論上傳到我們的網頁上（[https://youtu.be/GN6\\_aYlYMRw?si=4KxPkIuH1tID0r-S](https://youtu.be/GN6_aYlYMRw?si=4KxPkIuH1tID0r-S)），我們也將學者們的講稿與楊儒賓老師的回應搜集成期刊專號，在《思想》第 51 期上發表《辨析「中華民國」》的特刊。

我們在 2022 年繼續圍繞中華民國舉辦學術性與議題性極高的活動，包含與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合辦的「發揚道統：孫中山時代展 *Renovating the Way: Sun Yat-sen and his Era*」以及相關的國際論壇「*Rethinking the Ideals and Afterlives of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Series* 重新思考民國革命的理念與再生：國際系列論壇」。本場「孫中山時代展」，以孫文的國際性、中華性與本土性為主軸，透過這三個面向，引領觀覽者思考孫中山生平暨其革命歷史，以及辛亥革命背後的「道統」思想傳承。尤其，以孫中山為首打造的民國共和體制，在兩岸分治後仍存續於東南一隅的臺灣，這讓人不禁思索：道統的重構是否在島嶼已隱然成型？平心思問，在邁向當代，著眼跨文化、國際化的過程中，臺灣丟失或存續何種中華傳統裡的要素？如果維繫固有的文化基礎仍是未竟之業，究竟如何實踐？對於這樣的時代探問，本展覽藉由展覽晚清民初的書法、照片、報紙、藝術品等不同媒介的珍稀文物與孫中山本人、辛亥革命與臺灣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相關檔案（包括書籍、書畫、宣言、日記、地圖、國旗等），再次展現孫中山暨其時代內涵與歷史意義，引領觀覽者思考孫中山在想像、孕育中華民國時所展現的價值體系和文化理念及其對於民族的深刻關懷，並一同探索中華民國的現代轉型如何誕生。與展覽相關的論壇逐字稿後來以〈中華民國作為公業？民國與臺灣國際論壇〉為題目在《中山人文學報》第 56 期（2024 年 1 月）上發表。

在思考中華民國的議題上，本平台也進行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學術系列，從 2021 年至 2023 年舉辦「島嶼辯證法」系列座談。此系列座談以 1949 年作為出發點，思考中華民國政權遷移到臺灣對本島文化生態的影響，從現代文學、書法、舞蹈、油畫、戲劇、民間佛家、音樂、哲學等領域著眼。我們邀請了島嶼內外一系列的相關專家去討論與深化此問題意識。「島嶼」的「辯證法」並不指二元對立的衝突，更何況階級鬥爭，而指的是臺灣原來的漢人文化以及中華民國政權所帶來的教育結構與文化資源的錘鍊過程，「臺灣」與「中華民國」如何互相影響，彼此轉化。

臺灣學術界最近 40 年有一種極端本土主義的視角出現，將「中華民國」看成是

「外來政權」，強調它對臺灣本土語言與文化所進行打壓。在此極端的本土視角裡，中華民國本身甚至被看成是一種「再次殖民」的政權，延續了日治時期外來統治的性質。<sup>2</sup>「島嶼辯證法」系列想要回應極端的本土論述，展現中華民國到臺灣來之後對島嶼文化所帶來的刺激與活化，不再將「中華民國」與「本土臺灣」看成是二元對立的對象，而了解在 1949 年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政權所帶來的學術體系、文化資源、思想框架、藝術教育等如何正面地影響了島嶼的文化生活。用這樣的視角，我們希望以人文的柔軟力量解構二元獨立的思考模式，重新思考「中華民國」與「臺灣」的一體兩面的關係，如楊儒賓老師（2015，頁 96）所寫的：

當祖國走到台灣的懷抱以後，政治意義的中華民國縮小到台灣，經過一甲子歲月的錘鍊，原來的「台灣」內涵與「中華民國」結為一體。一九四九年在台灣史，甚至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關鍵性的意義乃是中華民國 - 台灣的一體化，此一體化將「國家」的內涵帶進台灣歷史的行程中，爾後台灣的幸不幸都是繞著這條軸心線展開的。

此一體化的過程無法用「外來政權」、「連續殖民」這些簡化的標籤來形容，而需要回到人文領域本身的發展脈絡去了解島嶼如何能夠代表「中華」，「中華」如何能夠滲透到島嶼文化的內在層次。在此系列中，我們當然沒有想要，也無法否認二二八事件與戒嚴命令對島嶼所帶來的傷害，不分外省與本省族群。但是我們想要從另外一種角度去了解中華政權與本土島嶼的關係。了解民國政權所提供給島嶼的生活條件與教育機構如何促進舞蹈、書法、視覺藝術、文學、哲學、宗教等新的發展空間與傳承機制是本系列的初衷。書法此充滿人與文的藝術領域是非常好的案例。1949 年之後台灣吸收了華人世界獨一無二的書法家，有的為國民黨的大官如于

---

<sup>2</sup> 為了進一步了解此極端本土視角的論述，讀者可以參考陳芳明（2017），〈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新版）》，臺北：麥田，頁 23-46；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San Jose, Calif.：蓬島文化公司；陳培豐（2011），〈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臺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臺灣史研究》18(4)，頁 109-164。陳培豐如此形容 1949 年之後的政權：「其實戰爭結束之初，臺人對新政府抱持高度期待。如過去在鄉土／話文運動中位居領導人物的郭秋生，便否認過去自己的主張，轉而認為學習中國白話文是臺灣人做為中國國民的基本條件，與「祖國」的政策同調。然而，郭秋生這種自我路線修正的妥協和期待，卻換來令人幻滅的結果。因為殖民統治並沒有因為日本人的離去而成為歷史，反而變本加厲地在臺肆虐。來臺後，國民黨政府以新的國語（即中國白話文）做為同化臺灣人的教育手段。在族群差別待遇的資源分配下，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快速出現了語言、階級、居住空間、經濟利益、生活方式等差距。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發生，以及戒嚴令的實施，讓本省籍菁英噤若寒蟬地從政治舞台退場。」（陳培豐，2011，頁 129）

右任、有的為中文學界的重要作家與教育家如臺靜農、有的為與滿清有親生關係如溥心畬。對楊儒賓老師而言，這些書法家展開了台灣 1949 年之後「新本土」的可能性：（楊儒賓，2021，頁 8）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同一個逃避戰亂的目的，漂泊來台。他們前半生的經驗多在海峽的對岸，他們書寫的文句多為中華文教傳統的內容，他們的書道傳授多可溯源至漢碑晉帖，顏肉柳骨，這些是臺灣的內容嗎？但這些書家分明在臺灣活動，在臺灣有師徒傳承，他們在臺灣寫招牌，演範本，被收藏；也在臺灣以他們的創作指點山水，活化古鎮，靈動生活；他們多埋骨臺灣，輾轉流離的藝術靈魂與臺灣的山嵐水氣共在。他們接受了臺灣，也被臺灣接受，沒有勉強，一切如此。他們最後既然已在臺灣與地共長，與天無極，他們的活動算不算臺灣的內容呢？他們是臺灣書家嗎？……這些書家的作品在臺灣被收藏，他們的藝術在臺灣被傳承，他們的生命意義在臺灣被發揚，其因素是臺灣社會決定的，無關乎政治。漢字符號、書法藝術、書法承載的漢文化內容，其中沒有一項不是內在於臺灣社會。他們在一九四九年進入臺灣，就像呂世宜、謝琯樵，於晚清融入臺灣，謝曦、張朝翔作品在乾隆、嘉慶年間撐起臺灣書壇一樣……他們早就屬於本土，而且豐饒了更有創造力的本土。

#### 四、柔軟勝剛強：「共生」作為「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的核心關懷

我們平台的視野不只是停留在重新思考中華民國作為公業。我們知道如果真的要調和當代世界所面對的一連串的衝突，包含中美衝突，俄烏衝突、以巴衝突等，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不可再運用以單純民族國家為主的思考框架。如果要回應氣候變遷的危機，我們也需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考，走向與天下萬物真正永續的道路。從執行平台的第一年，賴院長非常堅持我們一起構想與探討「共生哲學」的可能性。在 2021 年 7 月的時候，賴院長召集世界各地的中國哲學家參與臺灣學術界前所未有的「跨文化漢學的共生平台：發微《老子》與《莊子·氣物論》的共生哲學的潛力」的國際論壇，連結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美國、加拿大、日本的學者，對《老子》與《莊子》進行細讀，從中挖掘了「共生」的哲學基礎。參與論壇的學者包含芝加哥大學神學院任博克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劉笑敢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林明照老師、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以及華東師範

大學哲學系陳贊等學者。

在以上的論壇上，賴錫三老師與日本東京大學中島隆博有進行線上的英文對話，一起討論「共生哲學」的認識論基礎。在對話中，中島老師有提出如此對「共生」的定義：

我敢於提出以“co-becoming”或“human co-becoming”來重新譯解「共生」的原因。在英語的脈絡裡，人類（human being）這個概念必須聯繫到一個本質存在的 being 來理解，但是在東亞的脈絡底下，卻很難找到這種以歐洲中心的思考習慣做為範疇的存有論概念。相較之下，becoming（流變、生成）這樣的想法，能夠更有效地幫助我們以哲學的方式思考其棲身環境。與其繼續使用 human being，我們不妨重新思考 human becoming。我們一直是在流變生成中，才不斷成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這是一個從東亞視角出發的新起點。

在政治方面，特別是在戰前的日本社會氣氛裡，「共生」是一個被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是，做為一個哲學術語，它也有機會超出過往那種被高度政治化閱讀的意涵。因為它可以向我們展現一種嶄新的關於人類如何交往的形態。（賴錫三，2023，頁 369）

本平台深受中島老師的影響，將「共生」看成是一種流變與生成，不斷不斷「進行」的過程，沒有人能夠完全「完成」他們的存在（to have become），大家都處於正在完成、還未完成、永遠不完成的流動狀態中（becoming）。因為我們拒絕本質性不變的 being 來了解人類，而強調 being 的流動性與開放性，自我與他者之間永遠有彼此交流，彼此學習，彼此轉化的可能性。衝突不見得能夠避免，但是他們不需要被提升到本質性，互相毀滅的地步，永遠有彼此調節，彼此轉化的可能性。

賴院長自己最近幾年的研究受到了中島老師的啟發，想要以《老子》與《莊子》作為哲學的基礎，在老莊文本中看到了發展一種能夠緩解當代世界面臨的多種緊張局勢的思想資源。賴氏所發展的共生哲學的核心是拒絕兩極化的發展，這種兩極化只能透過暴力衝突來解決，賴氏稱之為「贏者全拿的生殺戰場」（賴錫三，即將出版，頁 1）。共生試圖形成一種「雙贏」的思維方式，希望以妥協和調和的方式化解矛盾，同時保護所有人的基本利益，提供彼此轉化的可能性。從老莊出發的「共生」提出一系列的思想工具，透過「柔」、「反」、「非常道」、「得一」、「天之道／人之道」、「無知」、「幽默」等概念來發展這種相互轉化的空間。賴院長認為全球思想

陷入了一種「終極解決」的思考模式，要徹底被解決所有衝突，而唯一解決的方式卻是一方完全破壞或抹煞另外一方。面對這樣的現實，以上的關鍵詞與相關的功夫可以發揮一種「去毒化」的作用，提供衝突的轉換餘地。（賴錫三，即將出版，頁 1）

迄今為止，賴錫三發展這種共生思維的策略為對《莊子》和《老子》原文中的關鍵段落進行仔細的深入解讀，並從它們的敘述中提取自我反省、降低衝突的彈性思想。例如，賴氏分析《老子》中「柔」概念的重要性，特別關注了文本的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sup>3</sup>

對賴錫三而言，上述話對於自我修養和人際關係的重構至關重要，如他所寫的：

第四十三章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其中的「至柔」（或柔弱），對照於「至堅」（或剛強），主要是就人的主體或自我狀態而為言。而「至堅」或「剛強」的自我，總是表現出「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自有功」的剛強意志，也就是說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意志狀態，充斥著爭勝、主宰、控制的強烈欲望。而「至柔」或「柔弱」的則是修養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有功」的虛心懷柔，也就是轉化了「相爭」為「共生」，轉化了「控制」為「任讓」。也就是說，「柔弱（至柔）」是把主宰意志給予虛心弱志，轉而因循於彼此共在的關係脈絡，以尋求共生之道。（賴錫三，即將出版，頁 15）

賴氏對老莊著作中的一系列段落進行了類似的處理，其中的精讀工作開啟共生所立足的自我反思性、虛心弱志、關係性思維。賴氏的詮釋策略與他過去十五年來在臺灣倡導的跨文化莊子研究運動是一致的，該運動仔細閱讀《莊子》和《老子》，將其作為應對現代世界危機的一種方式（賴錫三，2017，頁 3-30）。這也是與臺灣中華人文學科所倡導的整體方法論一致的闡釋策略，可用南宋文天祥的名言「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來概括。在此視野中，經典的古老智慧不僅被視為值得被保存，而且被視為一種可以激發內在修養和外在公共政策的現代力量。讓這古老的傳統在現代脈絡下發光發熱，是中華人文學科學者的任務，也是 1949 年之後臺灣的中文教育體系核心目的。（楊儒賓，2015）

<sup>3</sup>〔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120。

從 2021 年後半年開始，「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從小小的讀書會到重大的國際研討會，都圍繞「共生」此概念，要從哲學、藝術、文學、舞蹈等個方面展開它的內涵，促進重要的對話。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舉辦了超過一百多場活動。亮點包括 2022 年 7 月 8-9 日舉辦的「共生哲學與漢學之島」跨文化國際研討會，與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及東京大學東亞藝文書院合辦。研討會邀請了從臺灣、日本、香港、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與斯洛維尼亞來的學者，一起集思廣益，一方面「通古今之變」地對古典漢學資源進行價值重估；另一方面，齊力思廣義「共生哲學」，讓作為「跨文化漢學之島」的臺灣，在人類的焦慮年代，發揮其可貴的文化軟實力，構思超越兩極化的調節方式。參與此研討會，除了臺灣頂級的人文學者之外，也有遠道而來的海外學者包含芝加哥大學任博克教授、布洛克大學陳榮灼教授、盧布亞納大學羅亞娜教授以及東京大學石井剛教授。

在 2024 年 8 月 22 至 24 日，中山大學文學院以「天下秩序與共生哲學」為號召舉辦另外一場國際研討會，算是 2022 年的國際研討會的續集，吸引來自英國、美國、德國、加拿大、法國、中國、日本、韓國 8 個國家，共 22 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們共襄盛舉。國際會議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共同探討如何思考、參與甚至批判「天下」作為世界秩序新願景的概念、潛力與危險性。特別是，研討會將「天下秩序」與「共生哲學」進行雙向對話。參與研討會的學者主張共生哲學為尋求自我與他者、內部與外部、中心與邊緣之間，兩者相互轉化的過程，在多元萬物的世界裡，找到文化融合與敵意降低的「柔軟化剛強」之工夫。

與會學者包括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院士楊儒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何乏筆、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劉紀蕙、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林明照、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何重誼，以及遠道而來的海外學者 Benjamin Kindler、石井剛、白永瑞、任博克、宋冰、李庭綿、徐啟軒、張政遠、鈴木將久和鄭宗義到場參與，線上與會的重量級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趙汀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島隆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哲學系陳贇和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龔雋。

「國際漢學平台」圍繞「共生」的出版計畫仍不斷進行中。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透過了五南出版社發表《老莊思想與共生哲學》(2023 年)，臺灣學術界第一本探討「共生哲學」的專書。在未來我們打算與五南出版社繼續一起合作，出版「共生系列叢書」，包含以上兩場研討會的論文集，《島嶼辯證法》文集、「國際漢學家系列

訪談」文集以及著名國內外人文學者反思「共生哲學」的系列小冊子。關於英文發表，我個人 2024 年在著名的學術期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上分享給讀者「Co-Becoming」此概念，探討它對當代文化批評的重要性。(McConaghy, 2024)

## 五、在臺灣南部插上國際漢學的旗幟之辛苦：計畫執行上的困難與挑戰

以上所描述的學術亮點可能會留給讀者一種錯誤的印象，即執行「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的計畫的過程順遂且成功。我並不想要自命不凡。我相信此期刊的大部分讀者為學術界與圖資界的專業人才。因為如此，與大家分享執行「標竿計畫」上的困難完全合理，以便於在未來同仁們執行類似計畫的時候能夠做得比我們順利。執行計畫最大的困難之一為教育部不提供給計畫主持人相對的配套措施。因為計畫的經費非常多，計畫主持人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在規劃國際論壇、研討會、訪談等。這個工作完全是在教授們一般的學術工作之上。換句話而言，除了正常上課的責任、發表論文的責任、對系與校的行政責任之外，計畫要求大量的時間與精神的投入。衡量計畫的工作、教學的工作、研究的工作、行政的工作與家庭的生活是挑戰性極高的任務。

我有時候跟學術界的至友開玩笑：在執行「標竿計畫」之前我能夠享受一般的教授所享受的快樂生活，即每個禮拜兩三天上課，其他的時間安靜讀書、發展自己的學術招牌，偶爾在行政上幫忙系所。開始執行計畫之後，生活大大地改變，每個禮拜的閱讀時間幾乎全部被計畫吃掉，一直在規劃下一場國際論壇、下一場大師的訪問、需要與助理溝通，協調各種煩瑣的核銷事宜等。同仁們看我那麼辛苦，他們只能夠說「能者多勞，辛苦了」。其實這類的安慰修辭非常有問題，因為「能者多勞」很容易變成「能者過勞」，甚至為了計畫而犧牲自己的學術發展（沒有時間往內修身、閱讀有意義的作品、反思問題然後發表作品），也犧牲家庭和睦（因為舉辦那麼多學術活動，要招待那麼多學者，無法善盡夫父之職）。如何平衡學術單位建設的工作與家庭的責任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在《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的序言中，邱貴芬回顧她早期當教授的經驗，透過生動的描述展現此問題的複雜性：

兒子出生時，我同時撰寫博士論文，在沙鹿靜宜大學外文系擔任專任老師努力照顧家庭，善盡妻母之職。年輕的我疲於奔命，往返於我任教的學校、兒子的保母或是上學的地方，和我的住家，只要學校有活動而無法準時下班回家時就

心急如焚。努力內外兼顧而焦頭爛額的日子，竟然也就這樣走過了。兒子獨立成家立業了，今年他也迎接寶寶，進入我曾經經歷的人生循環。(邱貴芬，2023，頁 ii)

「無法準時下班回家時就心急如焚」是我非常熟悉的感覺，「努力內外兼顧而焦頭爛額的日子」是我正在過的。最可惜的是，不管你多麼努力內外兼顧，總是覺得你兩方都做得不好，蠟燭兩頭一直不斷燒，到有一天你個人就燒掉了。很多學術界的亮點就是以這樣個人與家庭的犧牲作為基礎。學術界幕後的重男輕女的文化是眾所週知的，「標竿計畫」不例外。

執行「標竿計畫」所要求的時間與精神上的投入不只是對計畫主持人有很大的代價，其實也是對學術單位內部的默契產生複雜的作用。因為其他的同仁都看到計畫主持人的辛苦，同仁們會對計畫保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不願意積極參與。其他的老師頂多願意參與幾場演講，發表一兩次的論文，但是接受大量的經費，負責規劃計畫中重要的項目，到目前為止相當保留。我需要立刻澄清：對我而言這個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同仁們保護自己的研究時間與身體健康是應該的。其實中山大學的教授的 **loading** (工作量) 已經夠多了，發展中的大學對他們已經提出不少的要求，不見得他們都能夠積極支持另類大型的計畫。

以上的問題也完全不限於南部的學校。其實，我們在全國各所大學所執行的標竿計畫上經常看到一種現象：某些計畫是一或兩位老師積極執行，掌握大量的經費，本單位的其他老師的投入相當保留，導致計畫所推動的「平台」也好，「中心」也好，都成為「**A One Person Shop** 一位老闆的店面」，雖然資源很豐富，但是在單位裡的規模很有限，幾本上只是一或兩位老師在執行而已。

教育部需要重視以上的問題，因為說到底，這個是臺灣學術人才的勞動力問題，是學者如何在臺灣的學術生態中永續發展的問題。教育部不是沒有可以提供的配套措施。第一，積極參與計畫的老師一個學期至少應該可以抵免三學分的教學負擔，會吸引更多的老師願意參與，在 **loading** 安排上比較合理；第二、籌備與執行計畫的時程需要大量的改革，從目前「一年經費／一年籌備時間／一年績效」的模式到更有彈性的「一年經費／兩年籌備時間／兩年績效」的模式。按照目前的模式，教育部所撥的經費需要在年底之前都用完了，而這一年的表現會被教育部評鑑。在未來，教育部應該將所有的計畫轉到兩年的籌備流程 (**two year planning cycle**)，即教育部提供一年的經費，但是提供兩年的執行時間。可以先用第一年當作穩健的籌

備時間，第二年當作執行時間。這樣計畫主持人真的可以好好安排活動，為了活動好好讀書、與國內外的學者做好溝通，超前部署，慢慢建設跨國的學術共同體，以踏實、穩定的節奏往前走。新的模式不會像目前強迫學者在時間很緊湊的情況下籌備、安排、閱讀、寫作、執行、出版與結案，導致資源雖然豐富，但是學術效果有限的現象。教育部需要意識到一種常識：**good things take time**（好事需要時間）要求一年之內籌備、執行、出版與績效評鑑對計畫主持人提供太大的壓力，導致很多老師不願意參與計畫。目前標竿計畫的實質情況為經費過多，執行的時間過少。應該剛好相反：不見得需要那麼多的經費，但是需要人生中最珍貴的資源：「時間」。「一年經費」加「二年執行」的新模式會解決很多問題。

總之，我執行「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標竿計畫的經驗有弊有利，是一體兩面的過程。我、賴院長與計畫靈魂人物楊儒賓老師確實有促進了一系列的重要對話，包含進一步思考「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島嶼辯證法」1949年之後的人文發展、共生哲學作為新的價值理念等。我們邀請了非常多第一流的學者到偏僻的西子灣來，山上的寧靜文學院一陣子變成活化的學術陣地。但是最近四年在我個人的學術發表上，甚至個人的身體與精神健康上，無法說沒有代價的。我最擔心的是我們在柴山上做的事情只是放學術界的煙火而已，舉辦活動的那幾天氣氛蓬勃，在未來可能會留下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文字紀錄，但當煙火結束，國際學者完成他們的渡假，柴山仍是這麼安靜，我們回到世外桃源的世界去，國際橋樑又需要被搭建一次。我們做的事情真的是有意義嗎？還是臺大、中研院、國圖永遠會當作臺灣漢學的國際中心，不管我們多麼的努力，我們只不過是南國邊緣的單位？臺灣的學術界也好，臺灣的社會也好，有一天真的能夠從「天龍國」的不平均狀態突破嗎？

雖然這些擔憂一直糾纏我，臺灣的學術界還是有它難以動搖的遊戲規則。因為我們在南部有發揮一點點作用，教育部已經邀請我們成立「全球共生與國際漢學」特色領域研究中心。透過此新建立的中心，我們希望可以繼續中山的國際化，在南部促進有意義的對話，進一步構想何謂「中華寶島」、「共生寶島」與「多元寶島」。但是我的擔憂還是存在：這些「特色領域」中心如何避免成為一或兩位人負責的機構呢？在勞動力的配套措施那麼不周到的今天，如何能夠說服老師們這些中心真的是「安全的空間 **safe spaces**」，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可以積極參與，學術發表不會受影響、身體健康和家庭和睦受到重視？

教育部希望臺灣第一線的老師們可以提出國際亮點。我個人希望教育部可以好

好思考國際亮點背後的各種奮鬥與犧牲。這些問題不是依靠一或兩位教授的默契或魅力能夠解決的。結構性的問題需要結構性的答案。改革是必須的，否則臺灣的「標竿計畫」永遠只是在放煙火而已。學者已離開了，光明也就走了。

## 參考文獻

-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120）。
-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San Jose, CA：蓬島文化公司。
- 邱貴芬（2023）。《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臺北：政大出版社。
- 陳芳明（2017）。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在《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新版）（頁 23-46）。臺北：麥田。
- 陳培豐（2011）。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臺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臺灣史研究》，18(4)，頁 109-164。
- 楊儒賓（2015）。《1949 年禮讚》。臺北：聯經。
- 楊儒賓（2021）。渡海來臺的新本土書家們。載於林俊臣主編，毫末起雄風：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新本土書家系列（頁 8）。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 楊儒賓（2023）。《思考中華民國》。臺北：聯經。
- 賴錫三（2017）。《儒門內的莊子》與「跨文化臺灣《莊子》學」。《中國文哲所通訊》，27(1)，3-30。
- 賴錫三編（2023）。共生哲學對當代世界、兩岸處境的迫切性：與中島隆博教授的對談，在《老莊思想與共生哲學》（頁 369）。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賴錫三（即將出版）。《老子》做為一種共生哲學——為共生而承認無知，為共生而承擔柔軟。在《共生哲學》。
- Allen, J. R. (2011).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cConaghy, M. (2024). Can Marxism, Liberalism, and Chinese Neo-Traditionalism Co-Exist/Co-Become (Gongsheng)? Provisional Reflections on Jon Douglas Solomon's The Taiwan Consensus and the Ethos of Area Studies in Pax American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5(6), 896-921.